

## 黄源的故乡情

王英

六月初，正当海棠花和一串红交相辉映的季节，著名作家黄源先生来到了他的故乡——海盐。他是应邀前来参加张乐平先生遗作捐赠及三毛乐园开园仪式的。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我有幸接待了这位与鲁迅和茅盾都有着不同寻常友谊的前辈，并进行了采访。

黄老在海盐宾馆下榻的房间里接待了我。这位刚过九十华诞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慈祥。得知来意，他使用纯正的乡音亲切地问我：“你想要采访哪个方面呢？”“想知道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家乡，走上革命文学创作道路的？”不知是我的话题刚好撩起了他多年埋于心头的记忆面纱，还是勾起了他对当时的怀恋之情，一脸认真的黄老听后，略一停顿，便微微点头说：“好，那就从格里（这里）讲起。”

黄源于1906年生在海盐西塘桥镇一个贫民家中。1921年求学嘉兴秀州中学，次年秋随姑夫到上海，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遍阅了各种中外报章杂志，尤其是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他日后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又聆听了世界文豪泰戈尔的演讲并得到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名师的教诲，阅读了大量的原版英、日文名著。1927年又得识鲁迅先生，开始了与之长达许多年的友谊，应邀主编了《译文》等进步刊物。

至今他还保存着鲁迅先生写给他的38封信。他说：“我原来是搞文学的，最多是搞革命文学吧，可是接触鲁迅之后，我的人生道路起了显著的改变，最终走上了参加革命武装，为推翻旧体制，建设新中国而战斗的道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与茅盾、巴金编辑的《呐喊》、《烽火》等文艺刊物在上海发行，对唤起民众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年底，因父亲病逝，他从上海返回家乡。此时战事已渐扩大到浙江，火车经过嘉兴站未停，直到硖石才停车。由于拥挤不堪，他只得从车窗里爬出来。他回乡安葬父亲，海盐的报纸都邀他撰写文章，他也以海盐报社的名义去慰劳国民党驻防乍浦抗日的63师。谁知正逢日本侵略军在乍浦登陆，部队按计划退到白茆，他随政治部的人员同时撤离，辗转回到海盐。当时部队的船停在天宁寺码头，他回家一看，家人都已逃到沈荡避难，仅留一佣人看守。他在父亲的灵前默默站了片刻后，即随部队的船去了硖石。次日，他赶去沈荡，把家人接到海宁。再渡江去了萧山。不料在兵荒马乱中与家长失散，无奈中他到了岌岌可危的杭州。等他回头往萧山找到失散的家人时，家人要他单独行动，以防不测。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他在无法回沪的情况下，于1938年元旦到了武汉，并联系上了那里的文化界组织。后经长沙回萧山与家人团聚。当他再次赶回家乡时，哪里料到他家的祖居已被焚毁，而余烟犹未尽呢！望着燃烧着的房子，他悲愤不已。在海盐呆了一个多月，他又经平湖渡江去了萧山，以后又辗转到了嵊

县、金华，最后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与故乡海盐一别，以后投身革命，并进行革命文学创作，今天算来，已经65周年了。

黄源先生的叙述虽然比较概括，但语言十分感人。最后，他感慨万分地说：“时间真快，一晃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那事总是留在我的心里，难忘啊！”——是的，黄老对家乡的那份挚爱之情将一直留在他的心中。

在海盐的日子里，黄源先生每天清晨在宾馆的庭院中散步，望着盛开的鲜花和蓝蓝的天空，会忍不住作一下深呼吸。他说：“家乡那空气，真清爽！”当他步出宾馆大门，转而来到交叉路口时，便走到那块路牌下，抬头仰面读出声来：“新桥北路。”然后转身对我说：“是去北门的路，小时候我常到那儿玩。”

次日，我们同去南北湖风景区游览，黄老的情绪显得特别兴奋，在谭仙石城，他这儿走走，那儿摸摸。一会儿远眺连绵起伏的群山，一会儿凭栏放眼近处青翠的山坡，不停地说：“真美，真美啊！”我告诉他，这是个历代兵家争战之地，这边是海盐，那边是海宁，此城是争战之地。黄老听罢竟像孩子似地跺跺脚说：“同时站在这两个县的界地，有意思，真有意思！”随同黄老来游的公子，许是被他父亲的情绪所感染，不停地对着黄老按动相机的快门，“卡嚓，卡嚓”，留下了以城岭为背景的黄老十分精神的身影。——相机摄进了家乡无限美好的风光，黄老还不时把我拉进镜头，同他一起合影。

在湖堤边的馨谷亭，黄老品尝着刚摘下的枇杷，看他吃得津

津津有味，我赶紧按下了快门。我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家乡的枇杷真甜！”黄老的公子在旁听说，告诉我，父亲只要是家乡的东西，他总说“好，好！”

初夏的阳光，照得人热刺刺，我的脸颊晒得红红的，黄老见了，打趣说：“你不用擦胭脂就化上妆了。”他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问我红不红。当我用他的话回答说“也不用擦胭脂时”，他高兴地笑了：“家乡的阳光，能让人返老还童。”

黄源先生走了，汽车载着他又一次从家乡走出去。然而，我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心并不平静，仍然留在故乡，留在他走过的地方。我相信，无论走到那里，他仍然会跟先前一样，心中思念着家乡这块热土。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一直为有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而骄傲。

海棠花和一串红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初夏的家乡点缀得更加艳丽。我衷心祝愿黄老如海棠花一般清健，像一串红那样有一个火红的晚年。——我盼望他常来家乡看看。

## 记著名版画家、民间工艺美术收藏家李寸松

陶 维 安

李寸松是浙江省海盐县富亭乡李家门人。生于1927年，从小酷爱绘画，后去上海求学，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45年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函授班学习，1946年成为该会会员。尔后参

加历次全国性木刻展览,并在《时代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长夜班女工》、《发财、发财、是谁发财》、《菩萨(捕杀)造像》,以上三幅作品现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此外,还有《焚书》、《战斗》、《逃亡到那里》、《告诉他、我们活不下去了》、《他能代表我们?》、《暑期作业》等,这些作品分别编入了1948年版的《中国版画集》和《新木刻》集。其中有七幅已为江苏省美术馆收藏。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参加沈同衡组织的“上海漫画工学团”。1948年4月起,漫画工学团组织地下“漫画月展”,借此进行革命地下活动,创作了歌颂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量版画和漫画。在上海交大、圣约翰、沪江、复旦、大夏等大学接连举办《春梦图》、《送葬曲》、《火的洗礼》等漫画展。《春梦图》等漫画在上海法学院展出时,国民党特务肆意破坏,殴打、逮捕主办学生,当并场抢走四幅漫画,其中三幅《快到了》、《等量》、《血决不会白流》均系李寸松的作品,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此间李寸松参加上海学联在交大举行的“五四营火会”和纪念“5·20”一周年的漫画活动等进步文化活动。

为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李寸松于1948年8月,进入苏北解放区,从事“华中五分区联络站”交通员工作,来往于上海与苏北之间,并受命秘密护送上海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去苏北根据地。

全国解放后，李寸松回上海任《劳动报》美术组长，上海市美协党组成员、上海新国画研究会学委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与张乐平、沈柔坚、米谷、蔡振华等名画家为知己，尤与张乐平甚为亲密，相互切磋，交流经验。195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调干班学习，结业后，留京在中国美协工作，历任中国美协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处秘书、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备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为中国美术馆、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研究员。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北京儿童玩具协会常务理事、北京风筝协会顾问，中国剪纸学会顾问、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顾问、海盐县博物馆名誉馆长等职。建国后的主要编著有《武松打虎》寓言画册、《中国民间玩具》画册、《中国乡土玩具》画册，《中国美术全集·民间玩具·剪纸·皮影》画册等。1992年2月受聘为《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编委会委员。1991年在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新兴版画60周年活动中，李寸松在新兴版画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新兴版画纪念奖”。1992年起由于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由国务院颁发荣誉证书，并享受政府发给的特殊津贴。

李寸松不仅在版画漫画事业上作出突击贡献。而且对我国的民间工艺美术和民间玩具的收藏和研究，展出上也是在我国属于

为数不多的一位收藏家。在解放前后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潜心于民间工艺美术和民间玩具的搜集、收藏研究、挖掘等方面化下了大量的心血，奔走于大江南北，足迹踏遍名山大川、黄土高原、边疆村寨，深入群众，采用访谈、搜集和发掘了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风俗资料，收藏了工艺美术民间玩具数以万计，有年画、花纸、门神纸马、皮影木偶、陶瓷器皿、雕刻彩塑、印染丝织、剪纸、风筝、刺绣草编等等（可惜部分藏品在“文革”中被毁）。

“文革”后继续进行收集予以填补，但其中宝贵的工艺美术品只能是重新制作，已失去了年代和原有风格。

为了挖掘闻名江南的民间泥塑嘉兴曹王庙泥菩萨和“蚕猫”，解放后，曾数次不辞辛劳不远千里来到嘉兴余新镇曹王庙村，走访传人，终于在一九九三年重新恢复传统制作，将已失传数十年的江南民间泥塑重新面世。

李寸松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和民间玩具的收藏和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工艺美术界人士的关注。从五十年代起他曾先后赴苏联、法国、日本、罗马尼亚等国展出和讲学等活动，深受国际上同行的重视，其收藏的东欧、西欧、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民间工艺品和民间玩具也件数不少。

1993年10月，李寸松为了表达对家乡文化事业的支持，将收藏中的一部分民间美术工艺品和民间玩具捐赠于海盐县博物馆收藏，并在“绮园”内创建了“泥香室”，展出了所赠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和民间玩具，丰富了海盐县人民的文化生活。

李寸松虽年已古稀，但年老不服老，仍然有当年的革命精神，埋头工作，为我国的版画、漫画、民间工艺美术事业继续在作出贡献。

1995年6月

## 军 旅 勤 奋 笔 耕 人

——记第二炮兵杂志社社长陈金松

侯 新 明

年末岁首，一位在军事新闻战线上辛勤耕耘了近40年的老新闻工作者，从他发表的一千多篇新闻作品中几经筛选，挑出100余篇通讯、散文和言论文章结集成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向人们捧出了一本沉甸甸的军事新闻作品集——《金盾与神剑》。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中将、政委隋永举中将为这本集子分别题了词。从这部39万字的书中，我们不仅能领略到金盾和神剑的风采，也能窥视到作者所走过的军事宣传之路。当这本著作无偿地赠送部队之际，笔者怀着尊敬的心情采访了该书的作者，第二炮兵《长缨》杂志社原社长、副编审陈金松同志。

陈金松出生在浙江海盐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8岁时父亲因患伤寒症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贫困的家庭生活，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追寻童年的梦，靠在上海当店员的哥哥的资助，勉强进了学堂。解放后，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1956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义务兵役制，师范毕业正在教书的陈金松毅然投笔从戎，参军来到上海公安总队。第二年，他被抽调到上海警备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办公室帮助抄抄写写，开始涉足军事新闻报道工作。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通讯《将军在田间》。1959年起正式步入军事新闻宣传领域。他曾先后就职于《上海民警报》、《人民警察报》、《公安部队报》、《解放军报》、《长缨》杂志。先后担任过班长、教员、记者、编辑、宣传（新闻）干事、记者组长、宣传处长、杂志社副社长、社长等。在近40年的军事新闻生涯中，前半段随着二炮的组建，服务于二炮部队的新闻出版工作，同“神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去过东北的密林，西北的雪原，南国的丘陵，中原的深山，东海的前哨，足迹几乎踏遍他所在部队的各个驻地。他深入到战斗现场、抗灾一线、边防前哨、导弹发射场……足迹所至，他带给人们的是关于金盾与神剑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而在这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又都浸润着这位新闻征途赶路人的心血和汗水，融入了他的艰辛与欢乐……

### 新闻记者是充满风险的职业，他知险而上

在陈金松的记者生涯中，曾经历过隆冬青海湖畔冰雪路上翻车、皖南高岭云雾中盘山道上车相撞、茫茫戈壁因赶路程跑飞车轮受惊吓、夜宿山脚小工棚时山头仓库意外爆炸险些被埋葬等

种种险情，却从没动摇过他当记者的信念。

1963年6、7月间，台湾当局在“反攻大陆”的喧嚣声中，屡派武装特务窜扰我东南沿海。当时在《公安部队报》当记者的陈金松，作为报社前线特派记者温州地区。一次敌人来犯，他跟随指战员，身背采访包，腰间别着临时配发的小手枪，一起横渡瓯江，翻越六七座大山，赶到前沿指挥所。这时，虽然大部敌人已被歼灭，但还有一些零星残敌隐藏在山洞、丛林中顽抗，不时传来阵阵冷枪。他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没有丝毫的畏惧，紧随搜索分队前进，一边记录战斗场景，一边进行实地采访，战斗一结束就迅速发回了《瓯江口瓮中捉鳖》等战斗、战地通讯。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军也加强了北方边境线上的防御。当时任《解放军报》记者的陈金松，奉命前往北疆一线进行战备采访。临行前，他没有向家人透露半句真情。在边境线上，冰天雪地，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他冒着生命危险，身穿皮大衣，脚蹬大头鞋，深入到一线阵地，能隐约看见对方的活动，听见对方破冰埋地雷的响声，双方都已高度戒备，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他不顾个人安危，在阵地详细了解了一线部队的吃、住以及物品存放等方面的困难，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使上级及时地了解北疆一线的战备情况，尽快地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他还深入到驻地群众中采写了北疆各族人民热情支持执行紧急战备任务的子弟兵的长篇通讯《父母心、骨肉情》，以及反映克拉玛依英勇民兵事迹的《油田卫士》

等通讯，鼓舞北疆人民的斗志。

### 新闻记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当仁不让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金松受解放军报社党委的委派，到总政机关收集揭批张春桥罪行的材料。他深知此行意义重大，几次找有关人员开座谈会，翻阅了大量资料，经反复琢磨，与人合作写出了一万余字的题为《毁我长城者必自毁》的长篇通讯，用大量典型事实，清算了张春桥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该文作为揭批“四人帮”的重头文章，由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和中央其他各报及省报都纷纷刊登，对清算“四人帮”破坏人民军队建设的罪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根据采访中的感受，利用采写《毁我长城者必自毁》一文所剩的“边角料”，撰写了杂文《张春桥的黑批示及其捣鬼术》，在《解放军报》一版刊出，形象而深刻地勾画出了张春桥善弄谋伎俩的本性，受到总部首长的称赞。

1978年10月底，二炮召开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大会。当时任解放军报驻二炮记者的陈金松，以记者特有的敏感和预见性及时抓住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新闻线索，采写了消息《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表达了群众心愿》，在《解放军报》一版显著位置刊出，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天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总理无罪，声讨“四人帮”有功，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造了群众舆论。不久，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年，群众到天安门

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这时，他又连夜采访了曾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二炮后勤部副科长刘东才、参谋张喜禄、保密员侯书智以及九位女战士的感人事迹，撰写了《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九女智勇送花圈》等多篇通讯，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宣传。

### 新闻记者得有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他矢志不移

有人认为，当记者总是跟旅行联在一起，天上飞地下跑，是个潇洒的行当。陈金松却说，想要潇洒，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当记者。的确，在他的新闻征途上，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接踵而至的艰辛和他永不懈怠的努力。

1976年7月，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来华演出，解放军报社派陈金松作为随团记者报道这次访华演出。当时军队的随团记者就他一人，因不懂朝鲜语，又没翻译，采访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加上各地的演出大同小异，如果不深入细致地采访，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报道。他凭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做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每到一地，他总是抢在别人前头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的背景材料，深入了解抗美援朝战争中英模人物的今昔。在协奏团去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访问演出期间，他连续向报社发回了《战友重逢亲又亲》、《友谊之火红烂漫》等富有特色的通讯。在黄浦江上徐

徐开进的军舰上采写《在友谊的海洋中》这篇通讯时，他提前赶往协奏团将要去演出的东海舰队，了解到海军某医院女医生王云仙曾在朝鲜战场上，亲自为朝鲜人民军伤员输过血的事，便密切注意观察她在联谊活动中的表情、动作，获得了感人的现场细节，使这篇通讯写得有情景交融，十分生动。当陈金松刚刚完成了随团采访任务回到北京，唐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他顾不得一家老小暂栖马路边防震棚的困境。又主动深入抗震第一线，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和频繁的余震，采访二炮某团指战员舍身忘死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感人事迹，在解放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就战斗在哪里》，他还与人合作发表了《英雄豪气壮山河》的报告文学。

二炮，作为一个特殊的兵种，非常强调其特有的保密性。由于这种特殊的保密性，二炮的新闻工作只限于共性报道，多少年来未能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陈金松联系实际，进行了认真思考。现代化部队的报道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不泄密的情况下把对外宣传搞得有声有色。身为记者组长、宣传处长的陈金松，对二炮的新闻报道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冒着酷暑严寒，一次次深入到导弹部队训练场采访，不失时机地采写各种型号战略导弹的实弹发射和二炮部队导弹训练生活，在中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导弹战士的性格》、《放牛娃变成了“导弹通”》、《来自发射场的报道》、《驾驭“巨龙”的人们》等一系列反映二炮

部队富有特色和别具新意的通讯，改变了二炮报道的旧模式，使二炮的宣传报道工作由过去单一的共性报道，发展到突出个性报道，个性报道与共性报道相结合的新阶段。

陈金松告诉笔者，那时当一名记者可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没有小汽车可坐，没有像样的招待所可住，有时没有电话可打，也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供参考，要想当好一名军事记者，写出反映时代精神、反映部队特色的好作品，就得有一颗全心全意为部队、为官兵服务的心，就得具备一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不怕风险的战斗精神。有人为他算过一笔帐，他在担任解放军报驻二炮记者的10多年间，每年下部队采访长达六七月之久。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深入基层，与官兵们一起住工棚，啃窝头，吃咸菜；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有时坐吉普车，有时搭乘过路的卡车，有时还得靠自己的“11”号跋涉。写稿，他总是依据经过自己深采细挖获得的可靠材料，忠实于现实生活。长期的新闻生涯，严谨的工作作风，使陈金松养成了一种正直、质朴、勤奋、办事认真而又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使他的作品真实生动、质朴无华、不加任何雕饰。在他的新闻作品中，很难找到不符合客观情况的描写和不切合实际的形容词。

如今，在军事新闻宣传队伍中享有一定名望的陈金松，从《长缨》杂志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本可以过悠闲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却不肯，仍以一个普遍编辑的身份在社里工作。不论在机关、下部队还是在家里，经常有一些部队报道员、新闻

爱好者慕名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地、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新闻写作知识和采写经验。部队举办新闻报道培训班，邀他讲课，他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他还在完成组织上分配的采、写、编任务之余，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采写经验和体会，写成一篇篇文章，每年在各种新闻业务报刊上发表几十篇之多。他说，他很敬佩新华社老社长穆青，穆青从社长的位置上下来后仍然干着一位普通记者的工作，过去没有来得及去过的地方他都想去跑一跑，写一写。穆青的这种敬业精神使他深深受到教育和激励，也许因了这种精神，也许是对事业无法割舍的情愫，陈金松，这位令人尊敬的具有记者和军人双重气质的老军事新闻工作者，仍孜孜不倦在绿色的方阵里勤奋地笔耕着，仍在为部队建设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新闻记者像一个匆匆的赶路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风尘仆仆，汗水涔涔，一生都在行进。”陈金松在他的作品集后记中这样写道。是的，与其说这是他对大半生时间所从事的这一行当的感慨，毋宁说这正是他自己新闻生涯的真实写照。

（原载1995年3月31日北京日报

《北京人物》版，收入本书时

作者作了部分修改）

## 抗日战争时期的海盐教育

宋立宏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日寇侵占海盐期间，海盐教育事业惨遭浩劫。抗战八年也是全县教育工作者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八年。

抗战前的1936年，全县有小学122所，185个教学班，在校学生6454人，教师251人。日寇入侵海盐以后，多数小学被迫停办，教师离乡背井，大批少年儿童失学。1943年，游击区共有小学9所，在校学生499人，教师15人。我县当时的小学校舍多系利用庙宇、祠堂和民房，即使这样简陋的教学设施也难逃日寇火劫，被毁殆尽。县立第一完小（今核电会堂东侧）、城中完小（今公安局址）、私立培风小学（今虹桥新村）等几所校舍设施较为完好的学校先后被日寇焚毁。历史悠久的学宫和蔚文书院（位于今核电新村）也被付之一炬。私立兴武小学（位于今海滨西路水沧桥畔）系朱瑞族人创办于民国初的一所校舍设施完备的学校，在战乱中也被拆毁。据战后县政府不完全统计，全县抗战期间被毁校舍428间，校具、教具3万余件，图书3万4千余册。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全县教育工作者与全县人民同仇敌忾，顽强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有的还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华大地上活跃着一支以少年儿童

为主组成的特殊的抗日队伍，她就是名噪海内外的新安旅行团。1936年12月，该团由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汪达之率领从嘉兴到沈荡、坎城、澉浦及县城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到海盐县城后住在塘湾小学。在新安旅行团的宣传鼓动下，塘湾小学师生率先上街抵制焚烧日货，教育界群情激愤，上街游行，高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在海盐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对日伪的残酷统治和推行的奴化教育，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海盐教育界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抗战初期，县政府在全县各地相继创设战时民众学校。1938年5月，县城城区、沈荡、澉浦、通元、西塘、坎城等地共设战时民众学校33所，有学生1800余人。同年6月，海盐县政府与省教育厅巡回施教团一起创设流动学校40所，实施战时巡回教育。尔后，为避免日伪的摧残，将流动小学改为私塾式教学。战时民众学校、流动小学兼施战时儿童教育和民众教育，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除了教书外，以各种方式坚持抗日救亡教育，以提高民众和儿童抗战必胜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沈荡抗日救国青年工作团于1938年在沈荡创办汤桥小学，招收失学儿童，最多时学生达200余人，教师由工作团团员充任。澉浦沦陷后，私立澉浦城南小学校董朱斐章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毅然停办学校，撤离教师，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

海盐县境沦陷后，针对日伪对学生强制实施奴化教育，教育